

# 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

赵文坦

**摘要** 蒙元时期共有六任衍圣公:大蒙古国时期的孔元措、孔洙,成宗时期的孔治,仁宗至顺帝时期的孔思晦、孔克坚、孔希学。大蒙古国时期虽有数位“权袭封衍圣公”,但只是权主祀事,并非实膺世爵。《阙里文献考》等志书记载孔思诚在孔治卒后袭爵达十年,并非历史真实。据曲阜现存元代碑刻可知,孔思诚未曾袭爵。蒙元统治143年间,衍圣公空缺的时间累计长达69年。曲阜圣裔得以袭爵,朝廷中儒臣的助力至为关键,跟皇帝对儒学的态度、孔氏族人的拥戴乃至孔氏族谱也有关系。

**关键词** 蒙元 衍圣公 主祀事 儒臣 孔思诚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2)02-0100-09

**作者:** 赵文坦,男,1963生,山东嘉祥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济南 250014

北宋仁宗于至和二年(1055)改封孔子四十六代孙文宣公孔宗愿为衍圣公。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衍圣公孔端友随高宗渡江,居衢州。金朝则以端友弟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主孔庙祀事。蒙古灭金后,曲阜孔子大宗子依然世世得为衍圣公。1986年,陈高华先生发表《金元二代衍圣公》一文,全面考述衍圣公之地位在金元二朝的演变<sup>①</sup>。1969年、1992年,姚从吾先生、萧启庆先生先后撰文考述孔元措复爵经过及衍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朝的存续情况<sup>②</sup>。近十几年来,研究孔氏家族和衍圣公的著述渐多,其中一部分论及元代的衍圣公,研究范围上有所扩展。然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经过仍有剩义可寻,某些史事尚待考证。本文依据曲阜碑碣史料及元代文献,对蒙元时期衍圣公世系、袭封经过等问题作一些新的探索,并对“权袭封衍圣公”、孔思诚曾否袭爵等问题作一些辨析,希望得

<sup>①</sup> 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载《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sup>②</sup> 姚从吾《金元之际孔元措与“衍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朝的继续》,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宋辽金元卷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萧启庆《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载《内北国而外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到专家师友的教正。

## 一、大蒙古国时期的衍圣公

1. 第一任衍圣公孔元措。孔元措字梦得，孔子五十一代孙，原是金朝的末代衍圣公。贞祐二年(1215)金宣宗迁都汴京。次年，孔元措应诏赴汴京避乱，委托其族兄孔元用权主祀事。成吉思汗二十年(1225)元用率众降蒙，授曲阜县令。翌年，元用战死于益都，其子之全袭职曲阜县令，并权主孔子林庙祀事<sup>①</sup>。金朝灭亡后，孔元措往依东平世侯严实。窝阔台合罕五年(1233)六月，因朝廷中汉化甚深的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的奏请，以及地方汉人官员与释、道二教领袖的积极推动，窝阔台合罕“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元史·太宗本纪》)，孔元措得以复爵<sup>②</sup>。孔之全在曲阜经营多年，虽将主祀权还于元措，但仍世袭曲阜县令<sup>③</sup>。孔元措熟习传统礼乐，擅著述，在学术界地位甚高，既得到金元士大夫领袖元好问的推崇，也得到耶律楚材、汉人儒士姚枢等人的尊重，对汉文化的传承、大蒙古国的礼乐制作贡献甚大<sup>④</sup>。孔元措是为蒙元时期由大汗宣授的第一任袭封衍圣公。

2. 第二任衍圣公孔浹。宪宗蒙哥元年(1251)孔元措卒。元措无子，其母弟元纮之孙孔浹袭爵。孔浹成为蒙元时期曲阜第二任衍圣公。据《阙里文献考》，孔浹本是孔之固的庶子，又曾随生母配驱口李氏，“已有名在驱口籍”，且其人“喜校猎，日事鹰犬，不修祖祀”<sup>⑤</sup>。次年，曲阜管民长官孔治率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孔浹遂被夺爵。孔浹母任氏曾为上书辨雪，书未达汗廷。又据《元史·姚枢传》，孔浹与族人争讼到总管漠南军国重事的忽必烈藩邸，忽必烈训诫道：“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可知孔浹的学养甚差，道德修养也不高，不能胜任孔子林庙祭祀事务，这是他被夺爵的主要原因。孔浹失去了爵位，孔之全、孔治父子也没能如愿袭封，于是乎“世爵在北者中绝”<sup>⑥</sup>。

3. “权袭封衍圣公”辨析。孔元措在汴京避乱期间，孔元用、孔之全皆曾权主孔子林庙祀事，有“权袭封衍圣公”头衔。后世修志、撰写史书，或将孔元用父子与金末降蒙前的衍圣公孔元措、南宋的衍圣公孔万春、孔洙相提并论，这未免抬高了元用父子的身份地位。清代史家孔继汾则说：“衍圣公在宋金元之交，南北各授其封是也。……再，宗子或因故他出，因命其子弟代主祀事，故有权摄之名。而金元之间，又率由省臣札委，并非实膺世

① 蔡文渊《孔治神道碑》载《阙里志》卷24，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第1787页。

② 萧启庆《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载《内北国而外中国》，第83—87页。

③ 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载《元史研究论稿》，第334页。

④ 姚从吾《金元之际孔元措与“衍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朝的继续》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宋辽金元卷第2册，第190、191页。

⑤⑥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8《世系》，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第166、167页。

爵。今家谱内于代摄祀事者,皆曰权袭衍圣公,盖尽失其实也。”<sup>①</sup>

孔继汾认为孔元用等并非实膺世爵,这一判断是对的。“权袭封衍圣公”的“权”是“代理”之意,孔元用、孔之全只是代行衍圣公奉祭孔子的职责,并非真的袭封衍圣公的爵位。但是孔继汾有所不知,金元之间“代摄祀事者”确实都称作“权袭衍圣公”。不仅孔元用父子,孔埽等孔氏族人也曾权主祀事,有“权袭封衍圣公”之“爵位”。孔元措于乃马真称制三年(1244,甲辰年)所立“宣圣墓碑”上刻“甲辰春二月既望五十一世孙元措立石”,碑阴有“四十九世族长 权袭封衍圣公埽”等字<sup>②</sup>。又,《阙里志》记载“壬子年二月,宣差东平路行军万户总管管民长官依奉牙鲁花赤众断事官言语,权授之全袭封衍圣公,降到印信,兼曲阜令。”<sup>③</sup>牙鲁花赤是中亚花刺子模人,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投降蒙古,元宪宗初年,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断事官之长,主管汉地事务<sup>④</sup>。《阙里志》的这条记载当是抄录自元代典籍或碑刻,是可信的。当时的权袭封衍圣公应该不止上述三人。但是,“权袭封衍圣公”与袭封衍圣公虽一字之差,却有本质区别。袭封衍圣公须由大汗宣授,“权袭封衍圣公”则是由蒙古在汉地的军事统帅或地方行政机构封授的。在蒙古占领曲阜后至孔元措复爵前,孛鲁统帅的军事机构及后来的燕京行省封授的“权袭封衍圣公”与袭封衍圣公孔元措、孔万春及孔洙并不对等,换言之,南宋、金、蒙古三国不曾出现过三个衍圣公同时对等存在的情况。

## 二、成宗时期的衍圣公

成宗时期的衍圣公即蒙元时期第三任衍圣公孔治。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即汗位。他任用儒士,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在曲阜孔氏族人看来,尊孔崇儒的时代即将到来,衍圣公爵位之争再一次发生。《阙里志》收有孔之固妻任氏的上书《辨正孔洙表》,力辨孔洙“乃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之耳孙,五十二代袭封衍圣公孔之固之冢嗣”,“虽云庶出,实系长房”。前已言及,宪宗二年孔洙被夺爵时,任氏曾上书,未报。然此《表》并非宪宗二年的上书,而是忽必烈即位初年的上表,因为其中云“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龙飞九五,运应一千,始为儒教大宗师,今作中原圣天子”<sup>⑤</sup>。有“儒教大宗师”称号的是忽必烈而非宪宗蒙哥(《元史·张德辉传》)。所谓“皇帝陛下龙飞九五”、“今作中原圣天子”,显然忽必烈已即汗位,而且任氏认同忽必烈是汉族人的皇帝,冀望忽必烈为孔洙复爵。但孔洙及任氏仍然未能如愿。孔洙后来知

①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8《世系》,第169—170页。

②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09页。

③ 陈镐《阙里志》卷7《宗子世纪》,第315、316页。

④ 何高济、陆峻岭《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赛典赤》载《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陈镐《阙里志》卷23《辨正孔洙表》,第1700—1703页。

潍州,大约是至元初年罢侯置守之后的事。掌握曲阜县政权的孔治也未得到朝廷认可,原因在于儒臣的态度。中统初年,曲阜县是东平路属县,时任东平路宣抚使的姚枢向忽必烈奏告说“臣宣抚东平,尝闻先圣大贤之后,《诗》、《书》不通,义理不究,与凡庶等。”建议授杨庸为教官,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育之<sup>①</sup>。姚枢是忽必烈潜邸旧侣、元初名臣,处于师儒的地位,他对孔子后裔的评价足以影响忽必烈对孔子后裔的态度。

曲阜县尹孔治自中统四年起,“始权祀事”。至元元年(1264),蒙廷惩李璫之乱,罢世侯世守,行迁转法,但对曲阜孔氏仍按宋、金传统予以优待,孔治任职如故。尽管孔治权主祀事时曾有所作为,能尽心力于祭孔及政务,然终世祖之世都没能袭封衍圣公,一直以曲阜县尹权主祀事。至元二十五年,孔治年五十三,升迁为单州尹,其子思诚袭替曲阜县尹。至元二十八年,孔治迁转为奉直大夫、知密州事<sup>②</sup>。

就在孔治权摄曲阜孔子林庙祭祀期间,孔氏南宗孔洙被忽必烈召见。原来,衢州孔氏南宗衍圣公孔端友五传至孔洙,元至元十三年宋朝灭亡后,孔洙自然被夺爵。孔洙于至元十九年入觐,只得到了“国子祭酒”虚衔,实职则是提举浙东道学校事(《元史·世祖本纪》)。曲阜孔子林庙祭祀仍由孔治权摄。明清史志所载孔洙让爵于孔治的故事并非历史真实。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忽必烈之孙铁穆耳即汗位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附近),是为元成宗。次年,改年号元贞。《孔治神道碑》载,密州尹孔治觐见成宗于上都,在朝廷儒臣的帮助下得以袭封衍圣公:“元贞改元,公(孔治)见成宗皇帝于上都,时大臣奏:‘至圣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孙,其祖元用以军功没于王事,实开国立功之臣。治权奉祀事三十余年,有德有文,可袭封爵。’上可其奏,仍赐坐,慰劳甚厚,特授中议大夫、衍圣公。”<sup>③</sup> 阎复在大德五年(1301)撰写的《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中也说“元贞改元,先圣五十三代孙密州尹治入朝,玺书锡命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月俸百千,秩视四品。孔氏世爵弗传者久,至是乃复。”<sup>④</sup>孔治遂成为蒙元时期的第三任袭封衍圣公。

据《孔治神道碑》所云,朝中“大臣”奏请孔治袭封衍圣公的理由是:以血统论,孔治是孔子后裔嫡孙;从家世说,他是开国立功之臣孔元用的后人;从个人修养评判,他“有德有文”。对孔治所谓“德文”的判断与宪宗及世祖前期大相径庭。兹碑记载了孔治“有德有文”的事迹,如袭职曲阜县尹时勤政爱民,致力于学;权主祀事时修葺孔庙建筑;知单州时兴学校,延聘名士以成士风。兹碑并没有说明奏请孔治袭爵的“大臣”是何人。成宗时期的文治,跟阎复关系甚大。衍圣公得享种种待遇,亦多得力于阎复的帮助<sup>⑤</sup>。袁楠撰《阎复神道碑》说阎复在至元大德间独擅诰令典册,又称赞他“定孔子主祀,赐孔林洒扫及祀

① 姚燧《姚枢神道碑》载《牧庵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9页。

②③ 蔡文渊《孔治神道碑》载《阙里志》卷24,第1789,1790—1791页。

④ 阎复《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载《阙里志》卷18,第985页。

⑤ 见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第67条注释,载《元史研究论稿》,第345页。

田,皆所建明。兴国学,论庙乐,所助为多”<sup>①</sup>。可知孔氏复爵,首功当属成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承旨阎复。

### 三、仁宗至顺帝时期的衍圣公

1. 第四任衍圣公孔思晦。孔治卒于大德十一年(1307),此后,衍圣公空缺达十年之久,直到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衍圣公爵位终于由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思晦袭封。危素撰《孔思晦神道碑》记载:“(延祐)三年,族人合议,以公嫡长且贤,宜袭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决。平章政事李韩公偕礼部力主之。会仁宗皇帝问‘孔子之裔迨今几世,袭爵为谁?’李公具以对。仁宗亲阅谱,若曰‘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复奚疑!’且以前袭封秩卑俸薄,遂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月俸自百缗加至五百缗,铸印四品。”<sup>②</sup>

孔思晦成为蒙元时代第四任袭封衍圣公。就血统而论,思晦并不是第一代衍圣公孔宗愿的嫡长裔孙。和孔治、孔思诚一样,孔思晦是孔宗愿三子若愚的后裔,思晦的曾祖元孝与思诚的曾祖元用同是若愚的四世孙拂的儿子。拂三子,长元直,无嗣,次元孝,季元用。孔氏族人谓孔思晦为“嫡长”、为“大宗”,只是相对于孔治、孔济等支派而言。孔氏族人推举思晦袭爵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贤”。孔思晦幼年家境贫寒,好学不辍;成年后游京师,得到国子祭酒耶律有尚的赏识;任范阳县、宁阳县儒学教谕期间以俭约自将,教养有法(《元史·孔思晦传》)。如此学养操行,思晦自然得到孔氏族人爱戴,但这些条件都不足以使他袭封衍圣公。思晦之袭爵,得益于仁宗朝尊孔崇儒的大背景和朝中儒臣的帮助,平章政事李韩公所起作用尤为关键。

李韩公即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元朝著名儒臣,博学强记,贯通经史。成宗初年,李孟入选为诸王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师傅。后来答刺麻八剌妃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被贬到怀州(今河南沁阳),李孟从行。爱育黎拔力八达闲暇时“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李孟“善论古今治乱”,将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讲得深切明白(《元史·李孟传》)。爱育黎拔力八达益发崇儒,儒学修养益高,“通达儒术”,他曾说“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元史·仁宗本纪》)他即位之后,革除武宗时期弊政,任用儒臣,实行一系列新政,其中两项就是恢复科举制度和尊孔崇儒。而李孟在仁宗时三任相职,是当时“政治上的中心人物”,新政的决策者<sup>③</sup>。自孔思晦以后,曲阜孔氏内部基本形成了一套大宗袭爵、小宗世袭

① 袁楠《阎复神道碑》载《清容居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8页。

② 危素《孔思晦神道碑》,载《阙里志》卷24,第1796页。

③ 陈得芝《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664页。

曲阜县尹的制度,减少了爵位的纷争。衍圣公承袭制度的基本确立,是缘于李孟的极力主张和赞助。延祐三年,元明善任礼部尚书,马祖常撰《元明善神道碑》记载,是年(元明善)改礼部尚书,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孙思晦袭封衍圣公。事上,制可之。”<sup>①</sup>《孔思晦神道碑》中的“礼部”当即元明善。孔思晦得以袭封衍圣公,元明善也起了重要作用。最后由仁宗皇帝亲自查阅孔氏谱牒后并决定孔思晦袭封,可见其过程之复杂,审查之严格。孔思晦袭封衍圣公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尽管只有十八年,却经历了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七朝。孔思晦是专职的衍圣公,专奉祀事,特别是盛大祭孔典礼,衍圣公都谨慎从事。元朝名儒曹元用撰写、现存曲阜孔庙的《祭孔子庙碑》、《代祀阙里孔子庙碑》皆有相关记载<sup>②</sup>。

2. 第五任衍圣公孔克坚。顺帝元统元年,孔思晦卒,衍圣公袭封又出现危机。思晦的儿子克坚没有按照大宗袭爵制度袭封衍圣公,从元统、后至元年间曲阜孔子林庙碑刻可见,孔克坚仍称大宗子,但是由县尹孔克钦权主祀事。如此则破坏了元仁宗时期制定的大宗主祀、“贤者尹曲阜以治之”的继承制度,使衍圣公爵位又空缺八年之久。

后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孔克坚正式袭封衍圣公,阶嘉议大夫(《元史·顺帝本纪》,《元史·孔克坚传》),是为蒙元时期第五任袭封衍圣公。克坚字璟夫,少廓达通敏,博闻强记。始弱冠,游学成均馆,通《春秋左氏传》。后至元五年,克坚上疏请修饰庙像,“顺帝可其奏,赐山东历日钱之半给其费。命监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币二万五千缗勒碑以纪成绩”<sup>③</sup>。大约是这次奏请修饰孔子庙像,克坚得到朝廷和族人认可,得以袭封衍圣公。孔思立字用道,工词翰,历官太常太祝、监察御史等职,累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知经筵事,提调国子监。思立任职朝廷时,对曲阜孔子林庙乃至元朝的尊孔崇儒政策多有作为<sup>④</sup>。立于至正十五年(1355)的《孔思晦墓碑》未署“正奉大夫前中书参知政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知制诰同修国史族弟思立载拜书”,据此可知孔克坚与孔思立关系密切<sup>⑤</sup>。克坚袭封衍圣公,当有孔族中“有闻望者”思立的支持和帮助。孔克坚袭爵后,其身份在曲阜孔庙碑刻中由“大宗子”变成了“宣圣五十五代孙袭封衍圣公”,如至正元年《汪泽民谒林庙诗碣》未署“宣圣五十五代孙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立石”<sup>⑥</sup>,其他类似碑碣尚有不少,不枚举。可知孔克坚袭封衍圣公期间,其地位应该没有动摇。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世封其大宗为衍圣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为曲阜尹”的制度<sup>⑦</sup>。至正六年,中书省臣谓衍圣公

① 马祖常《元明善神道碑》载《石田先生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②⑤⑥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266、272、333、306页。

③ 宋濂《孔克坚神道碑》,载《宋濂全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8页。

④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80《子孙著闻者第十五之八》,第1700页。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295页《后至元五年孔思立祭孔碑》,第300页《后至元六年释奠宣圣庙碑》,第319页《至正八年代祀碑》(该书原作“朵儿只左丞相等代祀碑”)。

⑦ 周伯琦《大元释奠宣圣庙碑记》,载《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300—302页。

爵位与其品阶不相称,奏请升之。顺帝制授中奉大夫,易铜章以银<sup>①</sup>。衍圣公的地位再次得以提升。

3. 第六任衍圣公孔希学。至正十五年,中书省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迺推荐孔克坚明习礼学,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克坚子希学袭封衍圣公,是为蒙元时期第六任衍圣公。顺帝末年的曲阜孔子林庙碑刻,如至元十七年《手植桧碑铭》、至正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儿祭庙碑》、至正二十五年《魏元礼代祀阙里记碑》、至正二十六年《帖迈赤仲文谒林庙记碑》、至正二十七年《李国麟谒林庙记碑》<sup>②</sup>等等,多由“袭封衍圣公孔希学”立石或重立石。据此可以确定,直到元末,衍圣公孔希学的地位也没有发生动摇。总之,自孔克坚袭爵,曲阜又恢复了大宗主奉孔子林庙祀事、小宗世袭曲阜县尹的格局,直到至正二十七年孔希学率孔希章等投降明军。

#### 四、孔思诚未袭爵辨

大德十一年五月孔治卒后至延祐三年孔思晦袭爵,衍圣公爵位空缺达十年之久。然相关志书却记载,孔治卒后,由其子孔思诚袭封衍圣公,如《阙里文献考》卷八“世系”条:“思诚以世袭县尹嗣公爵,寻以非嫡罢封,止世袭县尹,迁国子监丞,安庆路推官,升知恩州,丁内艰不赴。”同书卷十八“世袭职官考”条“元仁宗延祐三年,衍圣公兼曲阜尹思诚以非嫡罢封爵,专尹曲阜。”<sup>③</sup>又将思诚罢封的时间记作延祐三年。《乾隆曲阜县志》所记略同。若如此,思诚袭封衍圣公的时间有十年之久。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多从其说。事实上,现存元代典籍及曲阜碑刻皆没有孔思诚袭封衍圣公的记载,也没有孔思诚在延祐年间任曲阜县尹的记载。试辨析如下。

1. 现存于孔林的《孔思诚墓碑》正文两行共18字:“五十四世孙翰□大夫濮州尹致仕孔公之墓”<sup>④</sup>。碑文中并没有衍圣公爵号。而蒙元时期的几位衍圣公,除了孔元措、孔沅的墓碑未被发现外,孔治、孔思晦、孔克坚及孔希学的墓碑上皆有衍圣公爵号<sup>⑤</sup>。

2. 蔡文渊撰《孔治神道碑》兼记孔思诚事迹,是根据孔思诚本人提供的材料撰写的,却未交待孔思诚嗣爵事迹。

3. 大德十一年《加封制诏碑》记该年七月,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玺书加封孔子“大成

① 宋濂《元故国子祭酒孔公神道碑》载《宋濂全集》第3册,第1588—1589页。

②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334页《手植桧碑铭》,第347页《察罕帖木儿祭庙碑》,第336页《魏元礼代祀阙里记碑》,第337页《帖迈赤仲文谒林庙记碑》,第338页《李国麟谒林庙记碑》。

③ 分别见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八《世系》第168页;卷十八《世袭职官考》,第410页。

④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342页《孔思诚墓碑》。其中一个字磨灭,但不影响释读。

⑤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244页《孔治墓碑》,第333页《孔思晦墓碑》,第357页《孔克坚墓碑》,第368页《孔希学墓碑》。

至圣文宣王”。同月,曲阜孔庙树立兹碑,碑末没有署立石人。同年十月《阙里宅庙落成记碑》未署“大德十一年冬十月东平晚进李谦拜手书”<sup>①</sup>,未详立石人。这两通碑皆没有孔思诚的信息。现存元武宗及元仁宗前期曲阜的其他碑刻也均未提及孔思诚,而权主祀事者另有其人,即下文述及的孔抚等孔庭族长。

4. 至大元年(1308)立于孔庙的《加封孔子圣旨致祭碑》是关于该年集贤院学士王德渊奉旨祭祀孔子的重要史料,兹节选其内容如下:“至大元年七月内,朝廷差官钦费圣旨加封祭祀事,……差遣本院学士嘉议大夫王德渊,于七日钦费宣词祭物到于孔林,卜于十一日丁卯,与守土官奉训大夫兖州知州马禧、孔氏家长抚,行三献礼。王德渊亲为祝文,宣赐银币,珍藏庙库。……五十二代孙曹州教授之明书,五十代孙孔氏家长抚立石。”<sup>②</sup>在蒙元时代,皇帝未有亲至曲阜祭孔者,皇帝宣差集贤学士到曲阜孔林祭孔,无疑是最高级别的孔子祭典。该次祭孔,行三献礼的是宣差王德渊、兖州知州马禧和孔庭族长孔抚,没有衍圣公或曲阜县尹的参与。在这通碑中,曲阜县尹和衍圣公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

同年九月立于孔庙的《皇妹大长公主祭孔庙碑》也含有“权主祀事”的信息,碑云:“至大元年冬闰月癸丑,承州报:皇妹大长公主、鲁王遣使致祭林庙。县僚暨族长以礼迓于道左,从至舍馆。……卜以冬季三日丁巳行事,……使者初献奠币,献爵,金紫炫耀,兖州监州迓都斛亚献,其终献则知州马奉训禧也。……五十代孙权主祀事抚立石。祖庙监修提控五十二代孙之进监修。”<sup>③</sup>兹碑文同样没有提及衍圣公和曲阜县尹(只言县僚)。孔抚虽没有参加献礼,但是明确记载了他权主祀事。

从以上两通碑文可知,该年衍圣公空缺,权主祀事的人是孔庭族长孔抚。接下来的至大二年、至大三年,曲阜孔子林庙没有留下来碑刻。元武宗在位期间(大德十一年五月到至大四年正月),关于衍圣公的人选,元代史籍、石刻皆缺载。

5. 曲阜孔庙现存有马利用撰写、立于至大四年十月的《祭告宣圣庙碑》。碑云:是年七月,仁宗遣资政大夫国子祭酒刘赓诣曲阜阙里祭祀孔子。十月四日,刘赓奉圣旨行祭礼,“与其事者,少中大夫济宁路总管臣隋有、奉直大夫兖州知州臣赵弼、从仕郎行御史台监察臣刘泰、进义副尉曲阜县达鲁花赤乃马歹”,碑末署“五十三代孙从仕郎曲阜县尹孔济、五十一代孙将仕郎、前济阳县主簿、孔氏族长元裕立石”<sup>④</sup>。尤可注意的是,像国子祭酒刘赓奉旨祭孔这样重大的祀事,济宁路总管、兖州知州、曲阜县达鲁花赤、县尹孔济以及孔颜孟三氏宗人都参与其中,唯独没有衍圣公参与,说明这个时间衍圣公仍空缺,权主祀事的应该是孔庭族长孔元裕。此后至延祐三年孔思晦袭爵,曲阜孔庙尚有碑碣二方,即皇

①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250页《加封制诏碑》,第251页《阙里宅庙落成记碑》。

②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4页。

③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255页《懿旨释奠祝文碑》,第256页《皇妹大长公主祭孔庙碑》。

④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257页《祭告宣圣庙碑》。

庆元年《也先不花拜林庙题名碣》和延祐三年《刘朝列谒庙碣》<sup>①</sup>，立石者分别为孔子五十四世孙曲阜县尹孔思逮和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济，碣文中皆没有衍圣公的信息。

综上所述，孔治卒后，衍圣公再次空缺十余年。孔子林庙祀事曾经由孔庭族长孔抚、孔元裕权摄。

## 五、小 结

其一，蒙元时期衍圣公的地位和品阶都得到大幅度提升，说明蒙廷在尊孔崇儒的高度上的确是超越了前代。然而另一方面，蒙廷对孔子后裔衍圣公爵号的封授时断时续，自成吉思汗二十年（1225）孔元用降附蒙古，至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267）明军占领曲阜，蒙古统治曲阜的143年间，衍圣公空缺出现三次，三次时间累计达69年，显示出蒙廷对孔子后裔的态度忽冷忽热。衍圣公空缺时，曲阜孔子林庙的祭祀由曲阜县尹或孔庭族长权摄，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由曲阜县尹权摄，这与金代衍圣公兼曲阜令正相反。

其二，蒙元时期衍圣公的袭封，多赖朝中儒臣的帮助。因耶律楚材的奏请，窝阔台合罕诏令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孔治之袭封，端赖翰林学士承旨阎复等朝中儒臣的助力。孔思晦之袭封，元中期著名政治家李孟和著名儒臣元明善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孔克坚袭爵，应该有族人孔思立的帮助。孔治在宪宗、世祖朝未能袭爵，与姚枢等儒臣对他的评价不无关系。

其三，由于孔元措的绝嗣和曲阜孔族内部的争斗，蒙元时期衍圣公的袭封不像宋、金、明、清诸朝有始终如一的嫡长子继承制<sup>②</sup>。朝廷及孔族往往需要明考孔氏族谱确认“大宗子”，如元仁宗亲阅孔氏族谱而宣命孔思晦袭爵。当然衍圣公自身的操行和学养也很重要，孔思晦的袭封和孔洸的罢封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蒙元时期衍圣公世系表：

衍圣公	①元措	②洸	③治	④思晦	⑤克坚	⑥希学
袭爵年代	太宗 5—海 迷失后称 制 2	宪宗元—宪 宗 2	世祖至元 31—成宗大 德 11	仁宗延祐 3—文宗至 顺 3	顺帝至元 6—至正 15	顺帝至正 15—至正 27
公历	1233—1251	1251—1252	1295—1307	1316—1232	1340—1355	1355—1367

① 骆承烈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261页《也先不花拜林庙题名碣》（该书误作“王信拜林庙题名碣”），第263页《刘朝列谒庙碣》。

② 若衍圣公无子嗣或遭罢黜，则以其弟或弟之子袭封，皆属特殊情况下的权变，并非对嫡长子继承制的否定或变革。见王宇《宋代衍圣公制度试述》，载《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邢铁《明清时期孔府的继承制度》，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